

金石善缘名一寺 潍县铁佛何处来(续)

□孙敬明

为破解潍县唐代铁佛四百多年的来源之谜，本报1月6日在15版刊登的《金石善缘名一寺 潍县铁佛何处来》一文引起广泛关注，今天作者继续带大家探讨铁佛来源之谜。

此“僧伽”非彼僧伽

据两明碑记，铁佛从昌乐宝泉院废寺迁入潍县石佛寺时间在隆庆五年（1571年）至万历十九年（1591年）廿年之间。《潍县金石志》载有金代大定十四年（1174年）昌乐县乡贡进士刘拱辰撰并书的《敕赐宝泉院记》：“……宋庆历（1041年-1048年）初，汗水中涌出僧伽大士，一夕现身二尺余，泊其曙也，居人共力出之，乃金铸之像，今正殿所置之像是也。越六年创院立名曰‘大圣院’。顷因兵火，碑记焚毁，院尚在焉，虽有实而无名。逮夫本朝混一区宇，圣主嗣兴。于大定初降旨告谕天下，诸旧来寺、观无名额者，许令人状承买。附居优婆塞路顺谓僧受曰：‘今朝廷有此恩命，公安能默然不闻乎？’遂告诣有司，出钱十万，乞申上给付名额。四年（1164年）二月终获奉敕命赐名‘宝泉院’。”检索考古发现与地方志乘及金石题刻，潍坊区域几乎没有发现唐宋时期严格意义上的所谓“僧伽大士”造像，所以我们认为碑文所言“僧伽大士”“大圣”均属于当时社会泛泛所谓之佛像。

刻石“弥勒”何处觅

饶为有趣的是，《潍县金石志》卷二《唐比丘尼妙英造铁佛像记》：唐“圣历二年（699年）岁次戊己亥二月丙戌朔廿二日丁未，比丘尼妙英去……神龙二年（706年），为兄君翰渡海征兵及诸行马等，敬造徘徊一所，又置弥勒像一铺，写铁为身，却坐莲趺，举高十尺……。”“右记高一尺七寸五分，广三尺六寸四分。刻记处广一尺八寸三分，十一行，行多者十五字，正书。出县治东北城垣下积土中，今存十钟山房。”

在这同一块刻石上，并列题刻《唐宋文师修弥勒庙铭》：“惟大唐先天二年（713年）岁次癸丑二月乙未朔八日壬寅……清信士宋文师居火宅，凭三车以扶危艰，处爱河冀一舟逾彼岸。见世田有变，勒石无销，永固崇基，镌铭无歇。”“右铭广一尺八寸一分，十三行，行十字，正书在比丘尼妙英造铁弥勒佛像记后。”如上妙英于此前武则天圣历二年（699年）至神龙二年（706年）建庙一所造弥勒像一躯，时过七年宋文师率家人续修弥勒庙。《潍县金石志》称这件刻石：“出县治东北城垣下积土中，今存十钟山房。”但是，遍检潍县地方志，绝无潍县城有唐代铁佛与寺庙的信息。

潍县最早的寺庙为观法寺。据唐开成四年（839年）日本圆仁和尚浮海西来大唐求法，登岸经登州往五台山，途宿北海县。其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云：“十九日……到北海县观法寺宿。佛殿僧房破落，佛像露坐，寺中十二来僧尽在俗家，寺中有典座僧一人……县城东西二里，南北一里，是先代潍州，今北海县。”乾隆《山东通志》称：“观法寺，在（潍县）县治东北，汉永平十年（67年）建。”乾隆《潍县志》卷二《坛庙》“观法寺，在县治东北，汉明帝十年（67年）建。景泰二年（1451年）僧宗宝重修。今废。”试想唐代潍州城如有铁佛寺，且与观法寺比邻（姑且按《潍县金石志》刻石出土位置年），圆仁定会游访录入《行记》；还有省、府、县志更不会漏载如此大佛与寺庙的，所以，这件刻石应是来自城外来运的。

潍州隋代创建土城，后历代修葺，或称“东莱首邑”，城防“固若金汤”。民国《潍县志稿》载明正德七年（1512年）莱州府推官刘信重修：“于是城西十里许，引小于（汗）河水注壕，提高水深，人马弗能渡。”崇祯十二年县令邢国玺重修，“以石甃之，绅民各认丈尺，不用衙役督催，听从民便。不数月而告竣。”如此简便易行修石城的措施，绅民自备石料，当

时城墙周围四里，时间数月，且所需大量石料，所以推测这件刻石或许此时，自城外运抵城下？并且，旧时刻石挪作它用，汉代以来就有此风。

另一种可能，是因为经济利益而刻意隐瞒刻石出土地点，这也是清代古董行的一种风气。如郭麐《潍县金石志》卷二，载《北魏崔懃造像记》：“魏员外郎、散骑常侍、中坚将军、三公郎中、中散大夫、高阳王右司徒府右长史崔鸿；平西府益州长流参军、荡寇将军、齐州别驾、司徒府城居参、东中郎、九州二郡贾板太使、徐州仓曹参军崔鹞；齐州录事参军、广川太守崔鹄。惟大魏神龟二年（519年）岁次己亥九月戊寅朔十一日辛巳，齐州东清河郡郿县人崔懃削减身资，造石像一躯，二侍菩萨……”“高一尺六寸三分，广二尺四寸一分，侧广六寸二分。共二十三行，行字不等，正书。出县城西，老仆胡太访得之。今存十钟山房。”1975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临淄区大武公社黄山北麓清理崔氏墓葬14座，出土墓志六方。1号崔鸿夫妇墓志；3号崔鹞墓志，鹄乃鸿之长子；5号崔德墓志，德是鹄之子；12号崔博墓志，博为鹄之子；14号崔鹞墓志一方。像主崔懃称籍贯“齐州东清河郡郿县”，地在今临淄区。如此造像应该出土于临淄一带。由此可见，《潍县金石志》所谓“出县城西”既是泛指亦是刻意。

潍县铁佛弥勒尊

嘉庆《昌乐县志》卷五《古迹考》：“石将军，在城南四十里营丘集西思母山东，戴弁仗剑而坐，状貌雄伟，覆以草亭。前志不载，询之土人，曰唐王征东，先锋大将军徐凯河南人，营于西山下，得御甲风而死，因为立像，改四木山为思母山云。按唐太宗贞观十八年（644年），命张亮、李世勣率步骑十万、舰五百，由莱州泛海亲征高丽，营丘为必经之地。将士道死，无足怪者，而予独怪此乡人尸祝不忘何地？……将军所过秋毫无犯，可知宜土人哀其死，而祀之也！顾《唐书》无将军徐凯名，而特传于千五百年营丘野老之口！然则将军虽未得平壤铭功，与薛李诸君比烈，而牧豎樵夫世世相传与此山终古矣！”由此可见当地对征东将军之崇敬，且营丘集与耿安近在咫尺，并属北海县（今潍城）。

如上所列《唐比丘尼妙英造铁佛像记》：唐圣历二年（699年）至神龙二年（706年），“为兄君翰渡海征兵及诸行马等，敬造徘徊一所，又置弥勒像一铺，写铁为身，却坐莲趺，举高十尺。”这段文字，有几点可注意，一造像年代为唐；二记载君翰渡海征兵；三为君翰及诸行马建寺造像，此处“行马”或“行军司马”简称，此官职曹魏始置。唐代于出征将帅及节度使下皆置行军司马掌军政，权任甚重。由此可见君翰军职极高，或类似“石将军”徐凯。四造像年代较《昌乐县志》所记唐太宗征高丽战事晚60多年，而参战者君翰年事已高，碑石记载其父母健在，其膝下有子、孙、曾孙。五“弥勒像一铺，写铁为身，却坐莲趺，举高十尺。”所以，从时代、坐像、体量、环境，自然使人联想其即潍县铁佛！那么唐代“弥勒”形象像又如何呢？

1978年，寿光县马店乡贾家村出土唐石刻造像：“造像通高55厘米，座宽22厘米。弥勒像束腰形须弥座上为释迦牟尼像，螺发高髻，二目微合平视，大垂耳，面相丰腴，端庄，胫间三道横纹，身着袈裟，衣褶层叠下垂至足部，内着僧祇支，胸前打一小结，袒胸。右臂弯曲，手掌向前（指残），似说法状；左手抚膝。双足跣露，踏于赑屃背上。通体贴金，可惜已脱落，衣褶内尚存少许，隐约可见。须弥座后端左右侧各雕负重力士一躯……铭文镌于须弥座后端：‘开元廿年（732年）十月十一日，田庆为身敬造弥勒像一躯，合家供养。’”（如图①）

同年，寿光县马店乡西文家村出土唐石刻造像：“通高46厘米，底座宽29厘米，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像。主佛高24厘米，结跏趺坐于束腰平座上，形体瘦长，螺发高髻，双目微闭，两耳下垂，面相丰腴、端庄，矮颈，左手（稍残）抚膝，右手置于右腿前端，五



寿光出土唐田庆造弥勒像。



寿光出土唐闫伯能造弥勒像。

指并拢，手掌向下，双足（右足稍残）跣露，踏于二仰莲座上。双肩的帔帛垂落于足部，袒右胸。举身舟形背光，背光上刻宝塔和两个半裸飞天……铭文镌于背光左侧。”（如图②）依据图片题刻分上下左右两侧：“惟大唐元年（762年），岁次壬寅，建巳月一日庚戌朔，四日壬子，闫伯能为己父，造弥勒像一铺，上为国王帝王，下及师僧父母，法界苍生，咸同斯福，合家普供养。”由寿光两躯弥勒造像，可证明潍县铁佛，即唐妙英为兄君翰渡海征兵及诸行马等造弥勒像，初安置昌乐耿安村附近寺庙，中经唐、后周灭佛而隐藏地下，宋庆历初随汗水现身，安置大圣、宝泉院，后寺院颓废。到明隆庆五年（1571年）至万历十九年（1591年）廿年之间，迁入石佛寺。如上明正德七年（1512年）重修潍县城墙：“于是城西十里许，引小于（汗）河水注壕，提高水深，人马弗能渡。”昌乐宝泉院在汗河上游，弥勒铁像出汗河，应辑于汗至城置於寺。而记建寺、铸佛、修庙的刻石，到清代后期归陈介祺收藏。

民国《寿光县志》卷之三《寺观》载三处铁佛寺：一在县城北郭之西北，“宁仪寺，一名铁佛寺……石刻‘唐垂拱三年（687年）经藏碑（见《金石志》年），清康熙癸丑（1673年）、光绪己亥（1899年）重修”；一在城东北三十里张家北楼；一在城西三十里高家庄，“佛坐像，中空身伟”。凡此证明，浮烟山南北唐铁佛寺四处，当时当地铸造铁佛乃一时风气，其反映区域佛教信仰造像文化之特色。

（孙敬明 字鑑泉，号辰生。中国先秦史学会周公思想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，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委员，山东省社会科学专家库成员、山东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，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，山东大学、烟台大学、山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及研究生导师，山东省博物馆特聘首席专家，潍坊市博物馆特聘研究员）